

# 县委书记焦裕禄如何调查研究

□ 朱佳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典范，也为我们进行调查研究提供了借鉴。

## 躬身入局、深入实际：“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常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虽然直白朴实，却蕴含着很深刻的道理，体现了凡事探求就里的求实作风和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

为彻底摸清兰考1080平方公里土地的自然情况，焦裕禄带领由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的“三害”调查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兰考“三害”中，风沙是每年最先降临的第一害。焦裕禄对“三害”的调查就是先从调查风沙的危害开始的。每次大风起，焦裕禄就往外走，说“正是我们调查研究的好机会！”哪里风沙最大，焦裕禄就带着调查队往哪里去。一天又起风了，焦裕禄和调查队的同志前往沙丘最多的仪封实地调研，他们迎着风沙走，车子骑不动了，只好推着走。有时前行一步，又被风顶退两步。一行人在黄沙滚滚中艰难地上了黄河大堤。堤上有一个高高的测量架，为了察看风口，焦裕禄不顾大家的劝阻，登上了摇摇晃晃的测量架。他一边观察，一边飞快地在笔记本上画草图，标明位置，探寻风向沙路的规律。

1963年夏季，兰考县连降暴雨，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和其他县委常委分头带队冒雨观察，查清洪水流势，提出治理方案。随同焦裕禄调研的一位同志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上前劝道：“焦书记，你在家守着电话，我们三个下去吧。”焦裕禄摆摆手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要亲自探一探水路。”焦裕禄走在调查组的最前边，一边试探着水的深浅艰难前进，一边对同去的同志说：“你们看，这水正向东边流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咱们跟上它，找到它的老家。”他们顺着水势蹚水到了田庄、杜河庄、梁孙庄等，察看水情、询问洪水排泄情况。调查结束时，焦裕禄拿出自己画的洪水流向图，同干部一起商议察看的水路和应挖的河道。

在兰考工作的日日夜夜，焦裕禄就是这样带领“三害”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奔波跋涉。正是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才拿到了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内涝、风沙、盐碱的规律，为科学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础。向焦裕禄学调研，就要“下高楼”“出深院”，离开办公桌，亲自到田间地头走一走，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了解实情、“解

剖麻雀”，真正把调研做实、把情况摸透。

## 尊民为师、依靠群众：“办法还得到群众中寻找”

好的调查研究，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焦裕禄经常对干部们说：“在困难当中成就一番革命事业，必须首先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办法还得到群众中寻找”。

上任第4天，焦裕禄就到灾情最重的老韩陵公社和大队搞调研，他挨家挨户到群众家串门，问吃得咋样，看屋里有多少粮食，有棉衣被子没有？来到饲养员肖位芬老人的牛屋，焦裕禄虚心向这位有实践经验的老人请教改变兰考面貌的办法，在促膝长谈中，老人打开话匣子，把他几十年在风沙中积累的经验都说了出来：挖穷根种花生，要想富种桐树。此后几天，焦裕禄一直带队在老韩陵公社调查研究。通过调研，焦裕禄和群众一起制定出发展生产、战胜灾害的规划：一是发展畜牧，二是多种花生，三是种植泡桐，实实在在地为兰考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了治理肆虐的风沙，焦裕禄带领调查队骑着自行车、迎着风沙，走访求教许多有经验的基层干部和老农，到群众中找寻治理沙丘的好办法。当听说张庄附近有座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封固，几年来一直没让风沙搬走时，焦裕禄眼前一亮，立马前往张庄向堆坟的老庄稼户魏铎彬请教。经了解，魏铎彬母亲的坟每年冬春都被狂风掀开，他就尝试着挖出地下淤泥，把坟盖住，这样风再大也刮不开了。按照老庄稼户的经验，焦裕禄率领干部、群众进行小面积翻淤固沙、封闭沙丘试验。试验取得成功后，又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兰考群众用这种“贴膏药”的办法把全县危害最大的一些沙丘，全部用淤土封闭。

焦裕禄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带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尊人民为师，不懂就问，从来不搞“坐着车子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的虚招，最终探索出“贴膏药”、“扎针”、种植泡桐等治理“三害”的有效办法，以苦干实干把沙丘变成了沃野。

找准问题、有的放矢：“要改变兰考的面貌，干部是关键”

开展调查研究，就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做到有的放矢。焦裕禄搞调查研究，不是为了“出镜”、走秀，而是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

焦裕禄初到兰考时，为了尽快摸清情况，他先后找了县委十几位同志谈话，了解到一些干部被严重灾害压得喘不过气，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这个调研结果让焦裕禄敏锐而清醒地意识到：要改变兰考的面貌，干部是关键，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经过深思熟虑，1963年1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常委到火车站开现场会。看着外出逃荒的灾民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车站的角角落落，县委常委们深受触动，纷纷表示要齐心协力，带领群众同“三害”作斗争，彻底改变兰考的面貌。

在兰考的475天，焦裕禄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调查走访，获得了大量真实的一手资料，也发现了不少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有一次，焦裕禄收到群众来信，反映城关区盆窑公社个别干部的问题。他亲自去盆窑公社开展调查研究，与群众同坐一条凳拉家常、问近况、说心里话，让群众放下戒心、搁置顾虑，吐露真言实情。通过调研走访，焦裕禄发现一些干部不严格执行县委关于按劳分配的政策，有的为一己私利贪污多占，甚至放高利贷，损害集体利益，严重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群众意见很大。他立即会同有关人员认真做了处理。第二天，向全县发出通报，公开进行严厉批评。

正是因为焦裕禄在工作中牢固树立问题意识，把坚持问题导向贯穿调查研究始终，在深入调研中观察发现问题、思考分析问题，才能找到症结，针对兰考的干部问题开出良方。向焦裕禄学调研，就要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在解决问题中推动进步、实现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 井冈南麓的英雄村——江西省遂川县西庄红军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邱 明

巍巍井冈，泉江河畔，矗立着一座英雄的丰碑——江西省遂川县西庄红军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位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麓的遂川县城西南2公里的西庄村，于1991年兴建，碑座占地面积30平方米，碑高21米，碑身通体白色，呈六面棱柱型。碑身正面是萧克上将题写的碑名——遂川县西庄红军烈士纪念碑，右面是何长工的题词：“井冈山精神永世传”，左面是陈正人的题词：“为人民死 死有余荣”。纪念碑旁边建有遂川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西庄红军烈士墓，墙裙碑刻了西庄革命烈士名录和主要革命烈士传略。纪念碑底座北面镌刻着悼念烈士的碑文，全文如下：

遂川，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土地革命时期，遂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里，毛泽东亲自宣布了著名的“六项注意”；亲手创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取得了著名的五斗江战斗胜利；开辟了蕰林红色墟场，筹集了大批款物有力地支援了井冈山革命斗争。仅在土地革命时期牺牲的在册遂川籍烈士就达一千五百余人，尚有许多为革命牺牲的无名英雄，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西庄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成了遂川革命斗争的中心，成立了遂川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小组，保存了著名的“遂川六支枪”。西庄人民为遂川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红军的发展和壮大，输送了许多优秀儿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有当年中共遂川地方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一、遂川县委书记王遂人；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军独立七团团长王佐农；毛泽东亲授大印的首任农民县长王次淳；一身是胆、深入虎穴营救数百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王次樸；连送四子当红军，为革命壮烈牺牲的英雄母亲郭永秀等二十一名烈士就长眠在井冈山这块红色土地上。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 《群众》周刊：我党在国统区发行的唯一理论刊物

□ 王文贵

《群众》周刊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一份全国性的理论刊物。其筹办和出版历经曲折，1937年10月在南京筹办并于同年12月在武汉正式创刊，1938年10月到重庆继续出版，1946年6月迁至上海出版，1947年3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停刊，同时1947年1月在香港出刊香港版至1949年10月停刊。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前后近12年的时间内，共连续出版了405期，《群众》周刊的出版和发行，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艰难的出版和发行之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积极利用传媒的力量来影响舆论，宣传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党成立后，先后创办《向导》《前锋》《红旗》等刊物。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不久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面对新的历史转折点，1937年7月，周恩来带领秦邦宪（博古）、林伯渠等人同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继续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各项事宜进行谈判，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报刊的问题。8月中下旬，经周恩来同邵力子反复商谈后，邵力子才勉强同意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但由于上海、南京很快沦陷，邵力子要求到武汉再筹备刊物出版事宜。抵达武汉后，大家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遂川委员会  
遂川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

短短500余字的碑文，高度概述了遂川人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尤其是西庄村作为远近闻名的英雄村，向井冈山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儿女。敬读碑文，纵览一位位烈士的传略，一股浩然正气涌上心头，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后人铭记和敬仰。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遂川上井冈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经5次在遂川指挥战斗，3次入住遂川县城，他亲手建立了中共遂川县委、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和遂川县赤卫大队。1928年1月24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亲自向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王次淳授予大印，他指着王次淳向群众说：这位就是我们的县长，西庄人，农民出身，前几天还在挑大粪，现在要当县长了。但是革命靠一个县长是不行的，还要靠大家团结，今天我们要团结一致向土豪劣绅彻底清算。

大会还颁布了由陈正人起草、毛泽东逐条修改的第一个工农兵政府政纲——《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临时政纲》共30条，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土地、生产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方针和措施。为了让老百姓容易理解，毛泽东将一些深奥难懂的句子改成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如“不虐待儿童”改成“不准大人打小孩”，“废除聘金聘礼”改成“讨老婆不要钱”，“废除土豪的债务”改成“借地主的钱不要还”等。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县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创建地方武装，发展工农业生产，兴办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开展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尝试，为后来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

## 遂川革命斗争的摇篮

早在大革命时期，王遂人在西庄建立了遂川最早的农民协会组织，培养了王佐农、王次樸、王次淳等一批坚定优秀的革命者。1926年冬，王遂人与陈正人等在西庄创建了中共遂川地方组织——遂川特支，领导遂川工农及各界群众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西庄人民在血雨腥风中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6支枪，留下了地方武装革命的火种。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还专门提到了“仅遂川保存六支（枪）”。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城，派人到西庄寻找遂川党组织负责人，安排了一批西庄革命干部担任中共遂川党政军机构的重要领导人：六位县委委员中有三位是西庄人，王遂人被毛泽东指定为县委组织部部长（后来担任县委书记），王次淳为县委委员、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王次樸为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王佐农为县委委员（后来还当选为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据陈正人回忆，遂川县赤卫队有相当一部分党员是西庄人，班长以上的干部，也大多数是西庄人。井冈山斗争时期，西庄有300多人参加了农协，80%的家庭参加了革命活动，涌现了70多位革命志士，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和群众共有100多人，但只有40多人留下了姓名。

## “英雄母亲”郭永秀

郭永秀生有7个子女，除了2个男孩夭折之外，其余4个儿子全部被她送去参加红军，其中2人牺牲，1



人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她不顾年近，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经常为农民协会站岗放哨，收集情报。郭永秀全家参加革命，被地主豪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28年2月，国民党靖卫团闯进西庄，实行“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血腥屠杀政策，大肆烧杀，西庄成为一片火海，30多户人家被洗劫一空，60多人被关押，30多名无辜百姓被杀害。郭永秀不幸落入敌手。敌人使尽威胁利诱之手段，妄图从她身上探出赤卫队的下落，但她丝毫不为所动。敌人施行了各种酷刑，把郭永秀打得皮开肉绽。郭永秀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恼羞成怒，丧心病狂地说：“郭永秀一肚子尽是土匪，要剖开肚子看看，到底有多少土匪崽子！”最后，这位英雄母亲惨遭敌人剖腹而壮烈牺牲，时年68岁。（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事、政策，《群众》周刊侧重从思想上理论上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选载进步的理论和学术文章，并从理论上思想上批评和揭露各种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反动思潮和言论等。周恩来曾对《群众》周刊说：《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刊物，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更多地从理论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抗战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它们在宣传抗日主张、发展爱国民主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理论、壮大革命阵营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群众》周刊始终以贯彻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己任，高举团结抗战大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战略思想、战略方针以及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等重大决策，在对日作战、反对内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具体政策，宣传解放区军民的英勇奋战、建设成就，宣传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并针对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的侵略暴行、汪精卫之流叛国投敌的罪恶，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团结抗战、阴谋妥协投降和专制、独裁、反民主、打内战等的倒行逆施，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同时，生动报导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游击队和广大群

众的抗战业绩，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办好周刊。《群众》周刊端正办刊方向，始终沿着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前进，切实贯彻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之后至解放战争初期的总方针，在国统区内坚守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阵地，表现出鲜明的党性。在抗日战争时期，声讨日寇的种种法西斯暴行，粉碎日寇破坏中国抗战的种种阴谋，以极大的民族义愤激励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党顽固派，揭露其假和平真内战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

作为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党的理论周刊，按照周恩来对刊物的要求和定位，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更多地从理论视角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抗战胜利的必然性，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努力。在具体办刊过程中，采取灵活多样、贴近实际的方法，积极向国统区广大群众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如借助纪念活动刊发纪念文章、理论推介与理论交锋并举、通过刊载广告推介进步书刊、通过开辟读者信箱解疑释惑等等，成为国统区人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影响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